

【文化人物】

孔艳菊： 从文物修复中对望历史

记者 张瑞雪 路董萌 高峰
牛长婧 马晓迪 济南报道

修文物，与古代匠人交谈

“古人在制作这些物品时，倾注了他们的情感和思考。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凝聚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美的追求。”孔艳菊随手拿起完好如新的“得意之作”解释，“例如，竹子在古代被视为高洁的象征，而孔雀则代表了文人的尊严和高度。这些元素的选择，都反映了古人对自身人格的修养和对高尚品德的追求。”

孔艳菊凝神看着桌上的文物并自然地说起，在19年的修复中，她愈加能体会，古时的文物并非仅是物质的存在，更嵌入了古人精神世界里可考的痕迹。其实，每个匠人都在无意间书写下个体的记事。那些或古朴或艳丽的工艺品，无论是一件玉雕，一个花瓶，或是一串珠链，都在沉默而有力地表白着古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从百宝嵌、盆景、花卉、官灯、璎珞等精美雕饰品的修复中，她感受到了艺术超越性的价值，有时也超越了后人附会的解读。她发现这些古代工匠的制品并没有过多的个人情感或观念强加于其中，它们只是纯粹地展现了工艺的技术性高度和审美况味。这种艺术的风格或格调让孔艳菊深刻体会到艺术的另一种高度和美感。

每个能留存千年的物品，有着其深邃的可读性。孔艳菊深有体会地说：“坐在这里修文物，你会发现它完全是一个可以诉说的对象。仔细去读它，反复去读，永远有读不完的东西。”她强调修复文物的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通过反复揣摩文物的每一个细节，逐渐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故事。这不仅是对文物的呵护，还有一分对历史的敬意。通过修文物，她实现了和古代匠人“前辈”的神交，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共鸣和交谈，何其富有魅力。

入行，挥别过往的冒险

决心成为深宫里的文物修复师，孔艳菊也经历了一次小小的个人冒险。在她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时，学习的是如何雕塑一个大体量的物体，待到2004年毕业之际进入故宫，她却要处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指尖精细工艺。这里，她接触到了与大型雕塑截然不同的微小世界。那些微小的文物，仿佛是时间的碎片，每一处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她开始与这些几乎看不见的物件打交道，每一处修复都需要无比的耐心与技艺。

初入故宫的那几年，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曾经作为艺术家的自由生活被严格的工作时间所替代，只为与这些文

走在故宫雄伟庄严的宫苑内，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流转。在那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仿佛在低语，讲述着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和他们尘封已久的故事。有一个职业与这些珍贵的文物紧密相连，那就是文物修复师，他们不仅是故宫的守护者，更是那些千年文物背后的故事重述者，通过手的抚触，实现了人与历史的联结。



孔艳菊日常的工作台



▲孔艳菊的研究对象



▼孔艳菊讲解修复细节



孔艳菊的年轻同事

物亲密接触。那时的她还充满年轻的激情，对于枯坐灯下的工作的确有些无所适从。“我会觉得我的同学都是比较宽松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到故宫上班就得起早贪黑，四五点钟就起床，从望京穿到东城，8点钟上班也不能迟到，一开始的确不适应。”

三五年后，心态悄然有了变化。孔艳菊回忆说，“过了三五年，认真去考虑是不是认定了要在这干一辈子，你是否真的适合这个岗位。这其实是一个在学习中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慢慢地心态就非常端正了，绝不会应付完事。”

除了“术”的全然改变，创作理念与价值观的悄然嬗变才是更深刻的冒险。孔艳菊讲到自己的最初困惑：“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艺术创作到底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如何能够让别人记住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随着实际去做微小的事项和耐心完成每一个细节的重塑，她逐渐认识到，关注人的本性、关注社会、关注本质性的现象可能是使作品焕新深刻价值及“更上一层”的创作观。

这种勤于思考的习惯又反哺了实际的文物修复工作，那些曾经的大型雕塑，仿佛在她的心中缩小，与故宫的微小文物相互辉映，共同编织出一个关于艺术与历史的美丽幻梦。

让后辈在“身教”中成长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播出，为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镀上了一层神秘又富魅力的匠人光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有12个人，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知识背景和技术能力。”孔艳菊颇为自豪地说，“我们有从央美和清华工艺美院毕业的学生，还有学珠宝和材料的精英。大家共同研究、互相启发，共同解决文物保护和修复中的问题，整体氛围非常好。”

尽管自称不擅管理，但孔艳菊以她对待文物修复的热忱与严谨，让后辈在“身教”中得到了最饱满的成长。“我觉得大家能够自觉地去做事，这样最好了。”孔艳菊表示，“虽然我不适合做管理，但我会先尽自己的一分力，为大家创造一个轻松自觉的工作环境。从最初的两个人到现在的12个人，我们团队不断壮大，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认可。”

她为有生力量在这庄重宏大的殿宇空间引路，也是为文物修复工程开掘更有想象力的可能性空间。孔艳菊坦言：“其实，我们这个工作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故宫工作，故宫的每一件事情都备受关注。但我们也深知，这个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为传统文化作出贡献的一种使命。”

【短史记】

孔府档案起始年代新探

□徐进

档案，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文化传承的源头。分为9021卷、总件数超过25万件的山东曲阜衍圣公府档案（以下简称“孔府档案”），记录了明、清、民国四百多年间衍圣公的封诰、恩荣、典礼、交际乃至日常起居，以及衍圣公府的规章制度与经营管理，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瑰宝。央视纪录频道曾拍摄六集专题纪录片《孔府档案》，使这份文化遗产得到了广泛关注。

现存孔府档案的起始年代，学界通说始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终于1948年。2020年，曲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发表论文，将起始年代上溯到了嘉靖帝的爷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但在202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这位教授指出，成化年间的档案是一份孔氏宗谱，修成于成化十八年（1482）。民国十一年（1922），孔府曾整理过一次档案，编有目录，其中并未纳入这份宗谱。它应当是1956年到1962年间，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曲阜县文物保管所整理孔府档案时收入的，因此不能算作孔府档案的组成部分。现存孔府档案的起始年代仍以嘉靖为宜。

仅仅因为没有被孔府自家编的目录收录，就不能算作孔府档案的一分子吗？

笔者推测，这位教授可能考虑的是，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等单位整理孔府档案时，遵循的是“边抢救边整理”的思路。

当时许多明清世家大族、州县衙门的档案被处理，幸得郑振铎等文化名家奔走呼号，引起国家重视，各地档案部门、文保部门遂开展了大规模的抢救、征集、整理工作。著名的“徽州文书”便因此幸存，并在后续研究中大放光彩。所以说上述成化十八年的宗谱档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征集而来，而非孔府旧藏。

由于孔府档案原件尚未公开，我们无法进一步考证这份宗谱的来处。但笔者在阅读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时，根据杨向奎等前輩先生撰述的前言，新中国成立后对孔府档案的历次整理，均以孔府旧藏为中心，专家学者驻孔府工作，未闻曾向外界征集档案。此外，《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中，收录有《宋朝优免临江孔氏族人赋役帖》《荆府伴读孔定奏请优免疏》《临江府帖下新淦县为孔氏族人优免差徭事》三件档案，或可为现存孔府档案始于成化提供有力佐证。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籍隶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今吉安市新干县）的孔氏族人、荆王府伴读孔定上奏朝廷，请求照例豁免临江孔氏族人的徭役，如修筑城墙、开挖沟渠、平整道路、运输军械粮草等，并抄录了南宋时期临江孔氏先祖曾因系圣裔而蒙恩豁免徭役的档案（即《宋朝优免临江孔氏族人赋役帖》）。不久，奏折“上达天听”，得旨：“该部知道。”意思是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处理。豁免徭役，事归户部。户部遂行文山东布政使司要求查明临江孔氏是否为孔圣一脉，布政司又分别行文给曲阜县和衍圣公府。后者“于《祖庭广记》并《孔氏实录》碑刻内，查得孔绩（孔定直系先祖，唐末五代时人——笔者注）系孔子四十四代孙，任吉州军推官，寓江西临江府新淦县六十二等都分居住。”“六十二等都分”即新淦县六十二都，这里的“都”是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名称，阙里为孔府的别称。可见孔绩、孔定一族不仅谱系清晰，并且时常来曲阜祭祖，为孔府熟识。事实查明后，又经过一番公文旅行以及种种尚不知晓的原因，最终在成化十七年（1481）腊月二十六，临江知府以“说帖”（半官方的通知文书——笔者注）的形式告知新淦县六十二都孔定家族，嗣后“凡遇差役，许令（持此帖）责告优免”。由于此时距正统九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因此这份说帖以近千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既然孔定家族需要持此帖作为优免徭役的证据，为何会保存在千里之外的孔府呢？笔者认为，考虑到成化十八年孔府修订族谱以及孔定家族时常来曲阜祭祖等情形，这三件档案应为成化十八年由孔定家族抄录并寄给（或祭祖时带给）衍圣公府的抄件。毕竟天下孔姓族谱俱由公府编修，并且寓居各地的孔氏时常要借助公府力量，谋取豁免徭役等好处。因此这三件档案的年代，以成化十八年（或其后的较短时间）具有最大的可能性。诚然，若它们为原件，那么孔府档案的起始年代还可以上溯到《荆府伴读孔定奏请优免疏》落款的正统九年（1444）八月十一。

综上所述，《临江府帖下新淦县为孔氏族人优免差徭事》等三件档案为现存孔府档案始于成化提供了有力佐证。如今，孔府档案的数字化以及影印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相信将来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本文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